

MUSIC

音乐论著丛书

# 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

冯文慈音乐文集



回顾与反思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音乐论著丛书

# 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

冯文慈 音乐文集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冯文慈著.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8  
(音乐论著丛书)

ISBN 7 - 80692 - 166 - 4

I. 中… II. 冯… III. 音乐史 - 中国 - 文集 IV. J60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0000 号

---

丛书名 音乐论著丛书

出品人 洛 秦

书 名 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冯文慈音乐文集  
著 者 冯文慈

责任编辑 洛 秦

特约编辑 朱 震

封面设计 陈 岬

责任校对 谢轩江

电脑制作 梅晓英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邮 编 200031

电 话 021 - 64315769 64319166

传 真 021 - 647104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南通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字 数 220 千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100

书 号 ISBN 7 - 80692 - 166 - 4/J · 159

定 价 23.00 元



## 冯文慈

1926年4月生，天津市人。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中央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律学学会顾问，2000年—2004年任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1973年起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1993年底离休。学术成果：文献整理方面有朱载堉原著《律学新说》的标点注释本，《律吕精义》的标点注释本（获1999年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选注合作稿）。专著：在《中华文明史》中任音乐学科主编及主要执笔（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1994年度“五个一工程”图书）；《中外音乐交流史》（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外有论文四十余篇。

音乐论著丛书·第一辑

(按姓氏笔划排列)

- 《于润洋音乐文集》
- 《王安国音乐文集》
- 《王耀华音乐文集》
- 《冯文慈音乐文集》
- 《乔建中音乐文集》
- 《刘再生音乐文集》
- 《张 前音乐文集》
- 《杨立青音乐文集》
- 《杨儒怀音乐文集》
- 《陈应时音乐文集》
- 《陈聆群音乐文集》
- 《陈铭志音乐文集》
- 《茅 原音乐文集》
- 《郑祖襄音乐文集》
- 《赵晓生音乐文集》
- 《夏 野音乐文集》
- 《桑 桐音乐文集》
- 《袁静芳音乐文集》
- 《钱仁康音乐文集》
- 《童忠良音乐文集》
- 《戴鹏海音乐文集》
- 《戴嘉枋音乐文集》

责任编辑 洛 秦

封面设计 陈 岘

# 目 录

- 1 序
- 7 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
- 16 漫谈音乐的起源
- 18 繁音似锦簇 东西南北音
- 21 孔子“放郑声”辨析  
——“郑声”的社会习俗背景及其遗绪
- 36 西域音乐在唐代宫廷繁盛的原因  
——兼论西北高原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历史渊源
- 50 说唱命名辨
- 53 蒲剧唱腔和晋南方言字调
- 76 略论《十面埋伏》
- 88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  
衔接问题
- 94 汉族音阶调式的历史记载和当前实际  
——维护音阶调式思维的传统特点

- 127 释“宫商角徵羽”阶名由来
- 132 释伶州鸠答“七律者何”  
——附论对古代文献的解释
- 138 略论我国当前律制问题
- 150 朱载堉年谱
- 157 关于朱载堉年谱的补充说明  
——兼答吉联抗先生
- 163 朱载堉珠算开方术述评
- 177 朱载堉的落漠坎坷及其启示  
——为纪念朱载堉诞生450周年而作
- 185 关于朱载堉的释文的订正意见
- 190 简评“朱载堉纪念大会”中的《函告》
- 194 标点注释朱载堉《律吕精义》的概况和感想
- 200 当前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和史学方法问题
- 210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
- 217 中国古代音乐史进修体会  
——献给中青年同行
- 221 艺术•商品•心态

- 223 在音乐史学征途上不断前进
- 225 培养硕士生的体会
- 229 王光祈的音乐史学方法和学风  
——为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而作
- 238 崇古与饰古  
——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之一
- 242 雅乐新论：转向唯物史观路途中的迷失  
——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之二
- 248 防范心态与理性思考  
——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之三
- 257 转向唯物史观的起步  
——略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历史地位
- 267 坚持唯物史观 坚持反思  
——答孔培培、闻道同志，兼及向延生同志
- 282 评黄翔鹏“‘九歌’是九声音列”说
- 298 和翔鹏同志学术交往的一段回忆
- 309 附录 参考文目

# 序

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

冯文慈音乐文集

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出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涵盖了广泛的学术界，对我的心灵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触动。我理解，中国音乐史学领域同样存在着解放思想的客观要求。解放思想，就需要回顾，就需要反思。只有经过反反复复、再三再四的反思，才能比较准确地剖析过去，剖析自己，才能比较明确地辨明前进方向，推动学术工作。本文集的篇章大多是基于这种认识写成的，因此就将“回顾”和“反思”嵌入文集的标题。

在这本文集中，选录了我从1978年到2003年发表的拙稿34篇，篇幅适宜又比较重要的大多辑录在这里了。其中有一篇合作稿，也是由我执笔的。

这34篇中的第一篇《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可以作为这里“自序”的补充，主旨都是坦述我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对于当前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现状的看法，以及史学常写常新，因此需要不断回顾与反思的。

其余 33 篇笼统地可分为 5 组：

第 1 组共 8 篇，内容是中国音乐史方面；

第 2 组共 4 篇，内容是中国乐律学方面；

第 3 组共 7 篇，内容是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研究方面；

第 4 组共 6 篇，内容是史学方法和音乐史学教育方面；

第 5 组共 8 篇，内容是评论，涉及的音乐学家有王光祈、杨荫浏、黄翔鹏三位。

以下谈谈我对于中国史学以及音乐史学发展的粗浅认识，其后对本文集若干篇目进行简介，主要是讲讲回顾和反思的要点。

中华民族是热爱史学的民族，是尊重自己历史、尊重自己历史遗产遗物和史学成果的民族。我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实际工作，不断提高这一认识。

在中国，史学是门十分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不断更新的学科。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百年来，史学表现出常写常新、充满活力的态势。其所以如此，固然有新鲜史料不断展现方面的重要原因，而更为根本的动力则是人们在不断地追求重新认识自身的历史。

我至今仍然认为唯物史观是用以观察和解剖历史的一把金钥匙，不改初衷。但它的确需要循时而进，不断充实发展。这一点在理论上粗略地理解似乎并不困难，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思想上发生过的混乱，如何具体地重新学习唯物史观，特别是在中国音乐史学领域落实，我感到是个十分沉重而棘手的难题。最早触动我从实际问题着手，作为重新学习入门途径的，是对琵琶名曲《十面埋伏》的内容应该如何解释的反思。我认识到，项羽刘邦之争是题材，而根据有关资料，从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以及其中人的思想感情这一角度来分析，其内容应该是描绘元明之际的“边塞军事征战”以及人们对它的感受。这是我对于中国音乐史学比较自觉地独立地进行回顾与反思的开

端,因此我将写作这篇文章的 1978 年定为我的学术年龄起算年。但是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仍残留着某些“十年动乱”时期盛行的虚夸气息,这是我后来才有所发觉的。

此后,我继续依循回顾与反思的途径前行。先是在 80 年代初写下两篇短文《漫谈音乐的起源》和《说唱命名辨》,都不乏针对性。前者具有通俗性;后者从形式逻辑的内涵与外延着眼,评论“曲艺”一词的应用,但是话说得不似我后来的文章那么痛快。

《孔子“放郑声”辨析》较长,是我相当着力的一篇。两千余年来,孔子所说的“郑声淫”、“放郑声”,不知有几多论者,或褒或贬,但大多是从自身的实用需要出发加以“六经注我”式的发挥。我以为这是音乐史学中的一桩大公案。需要反思的是,孔子语录的前后文、原意,以及进行解释时是否将它放到当时的经济、社会、婚姻、歌舞习俗条件之中研究过?今天是否应当对这两句话重新研究和评价?

《西域音乐在唐代宫廷繁盛的原因》,是我注意到史学领域中比较新鲜的统计学方法之后,下了笨功夫写下的一篇。南北朝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胡乐”是否曾经风行,至今在中国音乐史学界仍然存在着或允或否的不同认识。统治阶层人物的艺术嗜好和积极倡导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我根据人物籍里所作的统计和结论,可供参考。

《蒲剧唱腔和晋南方言字调》,是 80 年代初我学习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的语言音乐学以后,在晋南运城又向蒲剧音乐家张峰、康希圣学习,由我执笔完成的。结论是:蒲剧唱腔符合与基本符合晋南方言字调的比例大体在 80%。我体会,这类研究有助于了解民族声乐创腔传统,或有助于当今的作曲和表演。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是我对于“重写”音乐史学术探讨的响应。标题中提到的两个问题——简单说:中西、古今关系问题,是关乎 20 世纪中国

音乐文化重大转折的问题,是否需要回顾和反思?当然,解决它需要经历相对长远的过程,需要努力奔赴,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点是我在文章中交待不够清楚的地方。

《汉族音阶调式的历史记载和当前实际》与《略论我国当前律制问题》,是从维护汉族传统音阶调式思维特点、维护乐制和律制多彩多元多线而写成的两篇。已故音乐学家夏野、刘国杰见到前一篇后,曾分别向我致函,一方面对基本论点有所肯定,另一方面对所谓变体音阶记谱法的繁琐提出批评。趁此文集辑录机会,我再次在这里表示接受。但在本文集中如果删除有关部分,前后文则难以衔接,因此只好一仍其旧,特此说明。这两篇都吸取了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关于律制“多线并存”的论点,后者还肯定了音乐学家赵宋光关于微分音形成是由于“跃迁”的论点。

《释“宫商角徵羽”阶名由来》和《释伶州鸠答“七律者何”》,两篇都不甚长,却是我学习王光祈的治学精神,以“九牛二虎”之力写成的。标题所揭示的前人不曾解决的这两个难题,我以为应该勇于探索。两篇文章涉及到的史学、美学等等方面结论,我至今仍自信不疑,但在具体环节上则心里不甚踏实。如有失误,前者是由于传统音韵学的根底不够,后者是由于古代天文学的知识贫乏。后者附论“对古代文献的解释”,可参见本书末篇《和翔鹏同志学术交往的一段回忆》。

自1984年起,在音乐学界乐律学热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推动下,我进行了关于朱载堉及其乐律学的研究,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二:第一,朱氏生平;第二,对朱氏主要乐律学原著进行整理标点。

朱载堉生平调查研究的成果有四篇,首先是《朱载堉年谱》和《关于〈朱载堉年谱〉的补充说明》。我认为,过去某些朱氏生平论述最值得反思的一点,是对其父辈、祖辈间的王位纠葛不分是非曲直,概以皇族“内讧”视之。其实,其父郑王朱厚烷冤狱

18年，应该说是比较易于判断的。其所以不分是非曲直，是由于受到“十年动乱”期间流行的“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影响——皇族贵胄间的王位纷争还不是“内讧”？对这一冤狱事件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就直接影响到对朱载堉生平的认识。当我们潜思朱氏取得伟大成就的动力时，很自然就会联系到冤狱事件对他心灵的深刻震撼，——所谓“贫寒出孝子，坎坷砺学人”，古往今来屡见不鲜。朱载堉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潜心律算，他那坚强无比的意志正是在坎坷境遇中砥砺形成的。此外两篇是《朱载堉的落漠坎坷及其启示》和《标点注释朱载堉〈律吕精义〉的概况和感想》。前者论述了其坎坷的身世及其伟大成就遭受落漠的社会根源。它是本文集中惟一用哀挽颂歌般的慨叹心境谱写的。后者则主要论述朱载堉一生给予人们的启示：人生各有机遇和定位，但是生命价值则都在于“创造”。

整理朱载堉原著，已经出版的专著有《律学新说》和《律吕精义》两部点注本及其两篇卷首论文，前者的论文较长，对其生平和成就有综合评介。本文集中的《朱载堉珠算开方术述评》，实际上是通过个别算例的演示，对于《算学新说》全文进行的诠释。

有关朱载堉的一组文章还有两篇：《关于朱载堉的释文的订正意见》、《简评“朱载堉纪念大会”中的〈函告〉》，是针对学术界诠释朱氏生平及其成就方面的某些失误而写的。

关于史学方法和音乐史学教育方面，我从来没有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当前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和史学方法问题》与《中国古代音乐研究中的逆向考察》两篇，内容大多是针对实际问题而发，可以说明我对于中国音乐史学前景的乐观展望和积极态度。前者曾提到回顾和反思的必要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的客观性、史学方法的多元化、思维方法等。关于音乐史学教育的四个短篇，都是我根据实际心得体会写出的。

评论的八篇，内容主要涉及唯物史观和对待古代文献两个

问题。评价音乐学者,无论其已经作古或在世,或高或低,见仁见智,均属正常。我自信对于听取、对待批评和反批评,尚有相当的胸怀与勇气。关于我评论黄翔鹏同志的过程,在《和翔鹏同志学术交往的一段回忆》中叙述得相当详尽,主要是围绕着古代文献诠释,如何实事求是、如何恰当地展开灵感的翅膀这一类的问题。关于评论杨荫浏先生的四篇以及和有关同志展开讨论和争议的两篇(包括《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我的愿望是兼及史学观念和具体问题,兼及逻辑和历史感的统一。

附带交待一下:本文集对原载刊物的文字,有极个别修订,但对原意并无影响。有的地方加了补注。在《略论〈十面埋伏〉》一文中删掉了不必要的姓名等,在《朱载堉的落漠坎坷及其启示》一文中增加了一个人名。

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做到往往不太容易,因而需要他人的关心、提醒和批评。本人和本文集正是如此。

冯文慈

2003年11月

# 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sup>(1)</sup>

题目所说的“从事”，包括学习、教学和研究，而主要是对终生学习的体会，因为教学和研究一刻都离不开继续学习，对我来说尤其是如此。

我之所以用“心态自述”的方式来谈谈对于当前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现状的看法，是由于不打算进行理论阐述，这样可能更为灵活自由。

## 1

### 成就和灾难引发的教益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音乐史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令人振奋。无论是古代史、近现代史，通史或断代史，也无论是其子学科或交缘学科，例如音乐思想史、音乐美学史、乐器发展史、乐律学史、音乐教育史、少数民族音乐史（包括历史上地域性少数民族王朝）、音乐交流史、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古谱学、乐种

学、图象学、作曲家作品研究、地域音乐文化研究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成果涌现。在相关的图书资料辑录及其科学管理方法方面,也有重要的学术成果,例如各种年鉴、书谱志、期刊文目索引等等,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便利条件。这一切,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压抑的生机猛然迸发,千姿百态,令人目不暇接。

说起“文化大革命”,除了那些含冤离世的以外,各种年龄段的人常常都会发出感慨,虽然内容有所不同,却又常常葛藤纠结;那十年——历经磨难;那十年——年华虚掷;那阵急风骤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遗憾;虽然不曾亲尝辛酸,其振荡的余波却如惊涛骇浪,铭刻在心。如此等等,自然叫人百感交集,不能自己。

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有史家认为,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磨砺,使得耕耘史学的心田获得无穷的滋养。远的不说,两千多年来大一统的中国历史究竟有些什么特征?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群众和精英,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唯物史观,……不是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生动的现实参照吗?意大利哲学家贝·克罗齐(1866—1952年),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消解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sup>(2)</sup>据此固然不能断言“历史不可知”,从而得出否定史学的消极结论,但是各个时代各种派别的史家,的确都很难避免其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对于他们认识历史打上的钤记;对史学来说,这其间既有不利于客观性的消极影响,又有促进深刻认识史事的积极影响。就中国来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人们难道不是能够更为深刻地观照历史、分析历史、认识历史,乃至洞察现实、谋划未来了吗?分辨“正宗品牌”与“假冒伪劣”的能力不是大大增强了吗?如此说来,“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需要相当的时间才会逐步显现,逐步认识,其引发的积极

教益也需要相当的时间,通过相当的实践来逐步认识。

就中国音乐史学来说,和其它许多学科类似,同样需要回顾百余年、五十余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灾难性的十年。我认为,需要反思,深刻的反思——这方面中国音乐史学做得如何?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事实上看法是存在着分歧的。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可能是,有的学者并没有如实估计“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侵蚀和危害。

## 2

## 反思和学术批评的潮流

1999 年,隆重纪念音乐学大师杨荫浏诞辰百年。本人不揣谫陋,在当年连续有四篇拙稿评论杨先生的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此后在刊物上论点有所交锋,不必细说。值得重视的是,倒是有学者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您(指我冯某)的唯物史观理论跑到哪儿去了?”<sup>(3)</sup>我想,意思不外乎是:一、“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音乐学大师如杨荫浏先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二、主张唯物史观者如你冯某,当时对于唯物史观史学又有什么贡献?关于上述第一点,我不赞成对极左思潮的影响采取淡化的态度。对于第二点,不妨以实相告:我冯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过芸芸众生中一介草民,不但对于唯物史观音乐史学毫无贡献,而且对于唯物史观也谈不上真正理解。我在 1973 年才开始进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从 1978 年才开始起算我的学术年龄。在中国音乐史学领域,遥望先辈大师,自愧难以望其项背。但我信奉古语所说,“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我还欣赏俗语:美食家不一定有烹调证书,普通食客(如我)也有权对美